

“我爱她如同好姐妹” ——宋庆龄与她忠诚的秘书兼同伴黎沛华

朱玖琳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出版

1972年3月21日，73岁的黎沛华因脑溢血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闻讯后甚是悲痛。那段时间，她在给各方友人的信中反复提到黎沛华之死带给她的悲伤。她对黎沛华评价很高，说：“她是一个考虑周到的秘书，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爱她如同好姐妹。”还说：“她是我30多年的秘书兼同伴，总是如此忠诚，她的中文很好。”^①

说是30多年的秘书，但是在民国时期，黎沛华并不像宋庆龄的另一位秘书廖梦醒，她的名字从来没有以宋庆龄秘书的身份见诸报端。作为秘书，她的名字经常伴随着的是何香凝，以至于何香凝女儿廖梦醒听说黎沛华当年也作过宋庆龄秘书时甚是惊讶。1980年6月，廖梦醒写信询问宋庆龄1930年代的往事，宋庆龄回复说：“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回想不起当时的情况。如果黎沛华还活着，她应该能记得一些事情，当时她是我的秘书。”针对廖梦醒的疑问，宋庆龄继续写信回复道：“黎沛华的确在1938年之前与我一起工作过。她帮助我在交通大学创建了一所医院，后来成为杨杏佛同志的秘书。而我则与鲁迅、蔡元培博士共同创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②新中国成立后，黎沛华应宋庆龄之邀，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任职，但她多数时间是随宋庆龄来往于京沪寓所做秘书工作，用女儿黄小丽的话说她经常陪同宋庆龄出差北京，在上海时就天天去中福会上班。^③这一点是她与宋庆龄的其它三任专职秘书卢季卿（1950年1月—1957年12月）、刘一庸（1965年9月—1967年8月）和张珏（1963年4月—1964年？月、1967年5月—1981）截然不同的地方。

因为宋庆龄沿用民国时期习惯尊称黎沛华为“黎先生”，所以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跟着宋庆龄尊称黎沛华为“黎先生”。^④黎沛华对宋庆龄而言，其实就像宋庆龄所说的，是老朋友，是秘书兼同伴，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下级和上级之间的关系，而是“好姐妹”、“好朋友”^⑤。

一、国民革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干将——广州篇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实现改组后，何香凝于1924年8月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以下简称中央妇女部），同时兼任广东省妇女部部长，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领袖邓颖超、蔡畅、刘清扬等通力合作，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发动并组织训练妇女投入国民革命，使得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甚为轰轰烈烈。中央妇女部成立的这一年，黎沛华即进入工作，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她的出色表现使她迅速从一般书记员升任部秘书，协助何香凝筹办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加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开办女工学校，慰劳东征军，欢送北伐军，组织救护队，主编《妇女之声》，等等。黎沛华可以说是何香凝最为倚重的助手。

^① 宋庆龄1972年3月24、29日致陈翰笙函，《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1月版，第38、40页。

^② 宋庆龄1980年6月3、6日致廖梦醒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656、657页。

^③ 据黄小丽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④ 据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周和康2016年1月31日对笔者口述；另见宋庆龄1954年11月28日致罗叔章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332页。

^⑤ 宋庆龄1972年4月8日致廖梦醒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17页。

黎沛华第一次聆听宋庆龄的教诲当在 1926 年 1 月的广州。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宋庆龄于 1 月 7 日由上海抵达广州参加会议。1 月 17 日，广州妇女界为宋庆龄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1 月 20 日，黎沛华主编的《妇女之声》第六期随即刊登了宋庆龄在欢迎会上所致答词。^①

何香凝曾在 1925 年孙中山去世后，一再请辞中央妇女部部长职务，请宋庆龄赴粤任职，但宋庆龄始终未允。^②在国民党二大上，何香凝依旧当选为妇女部部长。宋庆龄则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③在这次会议上，1 月 8 日，邓颖超代何香凝报告了全国妇女运动经过，主席团在听取五大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商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报告后，要求五大运动还应该有关决议案交大会讨论，遂选定宋庆龄与何香凝和邓颖超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④1 月 16 日，何香凝向大会报告了经三人审查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⑤作为中央妇女部唯一一名秘书（余者为干事——笔者注），全国妇女运动经过报告及妇女运动决议案的起草、讨论和定稿，黎沛华均应涉足。而妇女运动决议案极有可能就是出自黎沛华之手，其中第十条规定，为谋妇女运动发展，“中央妇女部应将组织扩大”，并列扩大计划如下：

1. 设部长、佐理各一人，计画指导全部工作之进行。
2. 在部长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监察四科，各科各设主任一人，其它若干人。
 - a. 秘书科专司内外往来一切文件。
 - b. 宣传科分为演讲、编辑、游艺三股。
 - c. 组织科专司敦促各地妇女部之组织与进行，以及各种妇女团体之组织。
 - d. 监察科专司监察女党员工作之勤恳，与纪律之遵守与否。^⑥

妇女运动决议案似乎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真正重视，3 月 8 日，广东各界妇女团体在黎沛华领导下，向国民政府请愿三项：（一）修改法律；（二）各行政机关容纳女子；（三）实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⑦而中央妇女部组织机构的真正扩大，则是在武汉时期了。

二、国民革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干将——武汉篇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1926 年 11 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宋庆龄作为国民政府先遣人员于 12 月 8 日抵达武昌。何香凝等国民政府第二批人员则于 12 月启程，秘书黎沛华和干事黄佩兰、伍夏理、随员马景云等随行。^⑧他们在南昌短暂逗留后，于 1927 年 1 月 12 日乘船抵达武汉，同车抵达武汉的还有坚持国民政府应该定都南昌的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他们受到了宋庆龄等先期抵达武汉者的热烈欢迎。

^① 见《广东妇女运动史料（1924—1927 年）》，广东省档案馆，1983 年 3 月刊印，第 1 页。全文亦见《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第 34 页。

^② 见“何香凝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5 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43.1；“中央秘书处致宋庆龄函稿”（1925 年 6 月 21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43.2；“宋庆龄致中央秘书处函”（1925 年 7 月 25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49.1；“中央秘书处致宋庆龄电稿”（1925 年 8 月 7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49.2；“中央妇女部致中执会函稿”（1925 年 9 月 3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案”，五部 2718；“何香凝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5 年 12 月 16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71.1；“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何香凝函稿”（1925 年 12 月 23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2071.2。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版，第 453—455 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 228、241 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 336 页。

^⑥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 343 页。

^⑦ 梁惠锦：《北伐期间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26—1928）》，载《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 年 10 月版，第 504 页。

^⑧ “党政府迁鄂之要讯”，《申报》1926 年 12 月 10 日，第 7 版。

武汉时期的中央妇女部组织机构比在广州时扩大了，共有 20 余人，其中有 9 名共产党员。部长之下有一等干事六人——邓颖超、蔡畅、刘清扬、黎沛华、刘蘅静、向警予；二等干事三人——黄佩兰、莫国康、李慕贞；三等干事四人——伍夏理、陆娜君（即陆晶清）、刘天素、胡兰畦；还有助理干事六人，以及一男性“录事”和一男性工友。黎沛华同时兼任部秘书。^①

1927 年 1 月 5 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议在武汉设立妇女党务训练班，并即席推举宋庆龄担任班主任。宋庆龄随即投入训练班工作。开班后，她曾以班主任名义亲自致函何香凝，“敦请先生莅校讲演”^②。单枪匹马的宋庆龄甚至连会计处理员都要自兼，由于班务过于繁忙，4 月，宋庆龄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班主任职务，并建议将妇女党务训练班归中央妇女部直辖。宋函谓：“庆龄自维凉薄，本难胜任艰巨，只缘上年鄂诸同志亟于提倡妇女运动，发起组织妇女党务训练班，公推庆龄为该班主任，将以提倡心切，谬徇诸同志之请，忝任斯职。现开班已将两月，办理各具雏形，庆龄事蹟才轻，身兼数职，时凛覆餗之衅，思维再四，与其敷衍因循，贻误党国，不若及早引退，用让贤能。谨以管见所及提呈二事：一、训练班宜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二、训练班当废除主任制改为委员制。以上二事，庆龄就两月来办理该班之经验所得，以为非此则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不能谋妇女运动进展之功。”^③4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决议准宋庆龄之请，“并请其提委员名单”^④。在宋庆龄的请求下，何香凝同意派出中央妇女部职员刘清扬、刘蘅静、黄佩兰为临时管理委员，维持训练班现状，她致函中执会谓：“香凝现与孙夫人商定，提出邓演达、顾孟余、孙哲生（孙科）、陈公博、孙夫人及香凝为该班委员，特呈钧会核夺。如孙夫人不允担任，香凝亦不敢负责也。”^⑤5 月 8 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上通过了经何香凝与宋庆龄商定、由中央妇女部推荐的妇女训练班委员名单。^⑥

自妇女党务训练班之事后，何香凝更加重视在妇女工作问题上与宋庆龄的合作。在宋庆龄倡议下，1927 年 5 月 26 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宋庆龄、何香凝，以及陈璧君、孙科夫人陈淑英、徐谦夫人沈仪彬、甘乃光夫人陈杏容、顾孟余夫人韦增英、邓演达夫人郑立真、连声海夫人唐允恭等 11 人为筹备北伐红十字会的联名发起书，说明为了救护受伤的北伐勇士，她们特发起一个北伐红十字会，“组织前方救护队和后方医院”。^⑦5 月 27 日，她们为筹备北伐红十字会在中央党部召开各界谈话会，会议决定将北伐红十字会改名为北伐伤兵救护会，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会务，由宋庆龄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⑧这一次，宋庆龄不再是单枪匹马难以为继，何香凝领导的中央妇女部是她坚强的后盾。中央妇女部为此筹办了妇女救护班，培训救护人员，一批随军出发到前线服务，一批留在后方，分配在各医院协助救护伤兵。救护班由宋庆龄主持，何香凝特派黎沛华、刘蘅静、刘天素等去负责实际工作。^⑨黎沛华对宋庆龄的协助工作因此而由之前的间接关系转向现在直接听命于宋庆龄的上下级关系。同时，黎沛华也陪同何香凝，前往北伐伤兵救护会在武汉甲站、丁站、贡园设立的

^① 陆晶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团结报》1984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陆晶清：《在何香凝先生身边》，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北京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版，第 202 页。

^② “妇女党部训练班主任宋庆龄致何香凝函”（1927 年 3 月 22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案”，部 16294。

^③ “宋庆龄上中执会呈”（1927 年 4 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 3050。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 926 页。

^⑤ “中央妇女部致中执会函稿”（1927 年 4 月 29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五部档案”，部 1333。

^⑥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 1113 页。

^⑦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第 791 页。

^⑧ 同上，第 792 页。

^⑨ 陆晶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团结报》1984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

三个后方医院，视察救护工作、慰劳伤病员。^①

就在她们为救护北伐伤兵而奔忙的时候，汉口当时的情况已很糟糕，就连与外界的电报联系也中断了，人们已开始纷纷离开汉口。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后，宋庆龄愤而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遂于7月18日秘密离开汉口回上海。何香凝也托病上庐山养病，黎沛华等人随行。^②

就在何香凝上庐山后不久，武汉国民党“清党”清到了中央妇女部头上。中央妇女部的共产党员早就撤离，而黎沛华等人因“共产嫌疑”被列入黑名单。何香凝本来上山时情绪就不好，听说此事后她火气更大，“天天骂人”，汪精卫之下的人“都挨过骂”。^③何香凝随即于8月10日从庐山致函汪精卫和谭延凯，证明黎沛华、莫国康、陆娜君（即陆晶清）、刘天素4人非共产党。^④信函邮寄速度慢，何香凝还为此事专门发出了电报。8月15日，在汉口中央党部召开的国民党中政委第四十六次会议上，会议主席谭延凯提出的议事第一案就是何香凝来电的问题，汪精卫随即指示秘书处办理，谭延凯提出还要复电何香凝告知，会议决议“照办”。^⑤8月17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函中央妇女部，谓黎沛华等嫌疑“可冰释”。^⑥同同时，何香凝还出面营救了中央妇女部的其他涉嫌成员。中央妇女部只有助理干事周秀珍因不及营救，在被捕第二天即遇害，其余人均受何香凝保护而幸免。^⑦

三、抗日民主运动的旗帜和志愿者——上海篇

黎沛华再次面对面地聆听宋庆龄教诲已是四年之后。1927年，宋庆龄离开武汉后，从上海秘密出走莫斯科，随后旅居德国；黎沛华在陪同何香凝离开庐山后，又陪她先后到上海、南京，随后于10月一同回到广州。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不再设妇女部，何香凝后来为黎沛华另谋了出路。^⑧1929年，何香凝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曾特地找到跟随丈夫黄祖培定居南京的黎沛华，在她家中住宿一夜。以后，黎沛华陪同何香凝出国，到菲律宾为仲恺农工学校筹募经费等，何香凝去法国后，黎沛华回国。^⑨

1931年，宋庆龄为奔母丧回国，于8月13日抵达上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宋庆龄决定留在国内从事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何香凝正在法国，闻讯后也决定回国做救国工作。11月28日，何香凝乘坐轮船抵沪，在黎沛华陪同下，她径直来到法租界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会晤宋庆龄，两人“畅谈甚久”。^⑩

何香凝抵沪后，即着手将她所绘写的书画开“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筹集抗日救护慰劳经费，并以余款开办“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一二八事变后改名为国难战士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支队——笔者注），以培养战时救护员。黎沛华“奉派在展览会及训练班服务”¹¹。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宋庆龄、何香凝均投入慰劳前线战士和救护伤兵的活动，并且相互交流和帮助。黎沛华也同时为二人的救国工作提供协助。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真如进行慰问，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上海在一天之内筹设

^① 刘天素：《良师、慈母——回忆在何香凝先生身边的日子》，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77—178页。

^② 见黎沛华1968年11月6日自书简历；陆晶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团结报》1984年1月21日，第3版。

^③ 陆晶清：《在何香凝身边的日子》，载《回忆与怀念——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第207页。

^④ “何香凝致汪精卫等函”（1927年8月1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15509.1。

^⑤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1329页。

^⑥ “中央秘书处致中央妇女部函稿”（1927年8月1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汉15509.2。

^⑦ 陆晶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团结报》1984年1月21日，第3版。

^⑧ 见黎沛华1968年11月6日自书简历。

^⑨ 尚明轩著：《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00、204页。

^⑩ “何香凝昨午到沪”，《申报》1931年1月29日，第13版。

¹¹ 黎沛华1968年11月6日自书简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86页。

了几十个伤兵医院。^①何香凝本人先与公时中学校长郭凤鸾（爱国人士蔡公时的遗妻），在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公时中学内创办了红十字会第十一伤兵医院，又与爱国将领陈铭枢夫人朱光珍，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创办了国难战士救护会临时伤兵医院。^②何香凝一向尊敬宋庆龄，在工作上尊重宋庆龄的意见，主动要求接受宋庆龄的指示。所以她特派黎沛华等经常去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向宋庆龄“汇报工作，请示所作计划，所采取措施是否适当可行”，宋庆龄总是很耐心地听她们的汇报，“很慎重很诚恳地给予指示”，还很关心地慰问她们：“你们辛苦了！”^③

2月12日，宋庆龄在十九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毅夫及其夫人的陪同下，偕正在何香凝筹办的公时伤兵医院服务的黎沛华和正在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救护队中工作的曾献声夫人，来到吴淞前线慰问第十九路军将士。她们与区寿年师长、翁照垣旅长和丁荣光团长一起合影。四位女性还一起在吴淞前线的断壁残垣中留下了身影。当时记者报道，只说跟在宋庆龄身后的女性是宋庆龄的“女友”。^④幸亏黎沛华将两张照片的原照珍藏了下来，并细心地记下了照片中人的身份。

其时沪上伤兵医院已有数十所，因为感觉上海的伤兵医院“数多而散漫，似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宋庆龄遂与何香凝共同在上海交通大学内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⑤这所医院不像何香凝在上海筹办的其他两所医院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它采用的是理事会集体负责制。宋庆龄和何香凝谁也没有担任院长，而是和陈铭枢夫人朱光珍等其他筹办人一起担任医院理事。医院3月5日安置妥当，可容五六百人，3月6日便有伤兵迁入。^⑥于是，黎沛华同时在公时中学和交通大学，“随宋、何二位先生在伤兵医院服务”^⑦。她还留下了3月8日同杨杏佛一起，随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慰问伤兵，为伤兵播放留声机的照片。这些照片为那一段历史留下了形象的注脚。

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后，因为大部分伤兵已告痊愈，国民伤兵医院的工作遂于4月中旬宣告结束，并在报端两次发布敬谢启事，公布经由宋庆龄、张乐怡、黎照寰、吴铁城、宋子安、杨杏佛、梁丽芳（名媛——笔者注）、陈健庵（时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笔者注）向各界筹募的详细清单，并谓：“本院款项支出报告至四月份止，由会计师审核后另印寄送捐款诸君。至所余款项，经五月十一日理事会议决，作为抗日废兵救济基金，并推定杨敦甫（时为上海银行副总经理）、黎照寰、杨杏佛三先生为基金保管委员。”^⑧

从4月份开始，黎沛华不再去何香凝在公时中学的伤兵医院服务，而是专心国民伤兵医院的工作。^⑨宋庆龄1980年给廖梦醒的信中说黎沛华帮助她创建伤兵医院后成为杨杏佛的秘书，显然是指黎沛华在国民伤兵医院服务时，及医院结束后的抗日废兵基金保管，和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工作上，她一直在协助杨杏佛的工作。同时，黎沛华从4月份开始为宋庆龄个人服务，也包括帮她处理私人事务。她为宋庆龄办的第一件私事也许就

^①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载《“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437页。

^② 张琼：《回忆何香凝在“一·二八”抗战中的救护活动》，载《“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454页。

^③ 陆晶清：《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文汇报》1981年6月4日。

^④ “吴淞战地视察访问翁旅长纪”，《申报》1932年2月13日，第1版；“妇女救护队往前方工作”，《申报》1932年1月31日，第8版。

^⑤ “宋庆龄关于国民伤兵医院谈话”，《申报》1932年3月13日，第3版（《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宋庆龄选集》上册，第87页）；“宋何组织伤兵医院”，《申报》1932年3月5日，第1版。

^⑥ 见《“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355—356页。

^⑦ 黎沛华1968年11月6日自书简历。

^⑧ “国民伤兵医院近况”，《申报》1932年4月9日，第4版；“国民伤兵医院启事”，《申报》1932年4月17日，第2版；“国民伤兵医院敬谢捐助款项及物品诸君”，《申报》1932年5月13、15日，第2版。

^⑨ 见黎沛华1960年之后自书简历。

是帮助宋庆龄保姆李燕娥办妥了离婚手续。^①或许因为黎沛华是由何香凝推荐而来，以及她深厚的学养和她在中央妇女部的经历，宋庆龄一直尊称黎沛华“先生”。1932年6月前后，黎沛华因病回南京修养，住在南京鼓楼医院。6月17日，宋庆龄致函慰问：“黎先生：你的身体近日好点吗？甚念，甚念！我自己亦在病中，候好些再给你信，请你到了上海通知我！祝你健康！”^②因黎沛华不识英文，不谙中文的宋庆龄一直是用中文给黎沛华写信的。作为宋庆龄的私人秘书，黎沛华陪同宋庆龄出席了各种公开场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她参与了同盟的事务；杨杏佛去世后，她陪同宋庆龄参加了杨杏佛的成殓仪式；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秘密前夕，她陪同宋庆龄赴招商局中栈码头，上船迎接来沪开会的国际代表……。在为宋庆龄服务时，黎沛华也不忘何香凝，曾在南京一路照拂迎接廖仲恺灵柩的何香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为何香凝成立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担任秘书，负责对内外一切文件函札。

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后，宋庆龄准备离开上海去香港。临行前，她特意安排与黎沛华和红色牧师董健吾之女董惠芳（董惠芳常来宋宅为宋庆龄传递消息。——笔者注）合影留念。^③12月23日，宋庆龄由中共联络员李云陪同秘密离开上海赴港。

四、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服务者——京沪篇

黎沛华与宋庆龄分别后，次年4月，她跟随丈夫黄祖培去杭州定居，年底因时局变化，转赴兰溪，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的工作，并先后任浙江省战时卷烟管理处秘书、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回杭州。因内战爆发，黎沛华不再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浙江政府机关工作。^④1948年11月黎沛华为躲避战乱从杭州来沪定居。^⑤此时，宋庆龄正在上海领导中国福利会从事战后救济福利工作。二人在上海再次重逢。

黎沛华带着女儿黄小丽到上海后投奔了宋庆龄，并于12月住进了刚刚修缮好的香山路7号。那时江亚轮惨案刚发生不久，小丽在厨房间穿来穿去玩，她听到大人们讲江亚轮的事情。^⑥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记录下了这一段经历，她说：“节日期间，我得了重感冒，一直躺在床上。还有几个来避难的朋友占去了我很多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小小的房子里住着四个小家伙，对家中从来没有孩子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喧闹了。”“我现在觉得我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欢歌》中的老吝啬鬼那样，四个孩子搂着我的脖子，把我的餐厅变成卧室。过几天我将统统把他们撵到我母亲的房子去，那里很快就会腾空的。真是谢天谢地。但眼下我还不得不接待我的老朋友。”^⑦1949年4、5月间，宋庆龄移居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她将老朋友黎沛华及其女儿安置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她母亲的老房子。^⑧在宋氏老宅住了没几天，黎沛华即通过老同学郭慕兰的帮助，搬到位于愚园路的另一位已离开上海的老同学卢家居住，不久上海解放。^⑨

上海解放后，宋庆龄随即委托黎沛华为在上海的劳动妇女筹办新上海第一所新型托儿所。那段日子，小丽正在郭慕兰开办的广公二小读小学，因为妈妈忙于筹办托儿所，无暇照

^① 黎沛华1960年之后自书简历；李云著：《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79页。

^② 原件藏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③ 赵志强，张万春著：《我和二阿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77页。董惠芳不记得黎沛华名字，误称为“李姑”。

^④ 见黎沛华1968年11月6日自书简历。

^⑤ 见“中山大学黄祖培履历表”，广东省档案馆藏，314-1-62；黎沛华1960年之后自书简历。

^⑥ 据黄小丽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⑦ 宋庆龄1949年1月16日致史蒂文森夫人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12页；宋庆龄1949年1月致王安娜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96页。

^⑧ 详见朱玖琳：《从书信集中寻觅宋庆龄自渝返沪后的踪迹》，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黄小丽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⑨ 据黄小丽2014年12月11日、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顾她，便将她送往郭慕兰家代为照顾。^①1949年7月24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在西摩路369号宋氏老宅隆重开幕，黎沛华是托儿所的第一任所长。开幕典礼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许广平等人向这位首任所长表示祝贺和感谢。^②在托儿所干了才二个月，黎沛华即因病辞职。12月，生活没有来源的她重回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担任人事秘书。^③1950年7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并进行机构改组，设主席办公室、宣传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处、人事处。^④黎沛华自1950年8月始在人事处工作，仍任人事秘书，后转办公室任办公室秘书，直至1963年8月正式退休。^⑤

黎沛华在中福会工作期间，多数时间是随宋庆龄来往于京沪寓所做秘书工作。^⑥由于她经常陪同宋庆龄去北京，尤其宋庆龄赴京参加国庆庆典后往往要呆到次年春节前夕回沪，女儿黄小丽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⑦1954年11月28日，宋庆龄曾写信告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并受中央委托与她保持联系的罗叔章道：“黎沛华先生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也在继续打针，仍须时日休养，所以还不能立刻来我处。”^⑧12月中下旬，宋庆龄便在黎沛华陪同下进京，直至次年4月方回沪。宋庆龄此时身边是有私人秘书的，是被她称为“卢小姐”的祝世康夫人卢季卿。1957年底，卢季卿调往卢湾区文化馆任馆长。^⑨于是，之前不定期来宋宅帮忙处理事务的黎沛华正式接替卢季卿担任宋庆龄私人秘书。1957年12月某日，黎沛华来到宋宅，先上楼去见过宋庆龄，之后便由保姆李燕娥引领到楼下，与寓所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早在1956年就来到寓所担任生活管理员的周和康是在这一天才第一次见到之前不定期来宋宅的“黎先生”。从此，黎沛华开始了每天半天（上午8时到中午12时）在宋宅的秘书工作，其余时间则通过电话联系。黎沛华当时已偕女儿住进中福会职工宿舍五原路205弄5号，距离宋宅并不是很远，所以她总是步行来宋宅上班。^⑩

黎沛华为宋庆龄处理人民来信，也为她打理家事，并代她关心她们共同的老战友、老朋友的后代，比如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王安娜之子王黎明。随着年事渐高，长期患有高血压的黎沛华逐渐力不从心了。1963年黎沛华因病要求退休，中福会遂安排行政科长张珏接替黎沛华。¹¹1963年4月1日，宋庆龄离沪赴京，入住周恩来总理为她精心安排的北京后海北沿46号，陪同她进京的就是新任秘书张珏。次年春，张珏即因父亲年迈需人照料而调离。¹²张珏走后，黎沛华虽然已退休，但依然帮忙宋庆龄处理各种事务。1965年，中福会安排原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办公室主任刘一庸担任宋庆龄的私人秘书。¹³9月1日上午，宋庆龄乘专机由上海到北京，黎沛华与接替她工作的刘一庸及保姆钟兴宝随机同往北京。黎、刘二人的行李是周和康张罗着从她们各自的住所搬到宋宅，再从宋宅运到机场。¹⁴此后，宋庆龄便在京长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时常京沪两地跑。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红卫兵扬言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周恩来总

^① 据黄小丽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② 严福富、林铭钢：《让祖国的花朵盛开——宋庆龄与幼儿教育》，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第3期，第10页。

^③ 见黎沛华1957年2月27日自书简历。

^④ 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08页。

^⑤ 见黎沛华1957年2月27日自书简历、1963年填“上海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审核表”。

^⑥ 戴辉：《黎沛华（1899—1972）》，《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1期，第18页。

^⑦ 据黄小丽2015年1月7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

^⑧ 宋庆龄1954年11月28日致罗叔章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332页。

^⑨ 祝文光：《父亲祝世康秘密宴请宋庆龄李济深》，《世纪》2009年第6期。

^⑩ 据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周和康2016年1月31日对笔者口述。

¹¹ 李云著：《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第86页。

¹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44页；张珏著：《往事不是一片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2年1月版，自序、第35、103页。自序中的“1963年春”系“1964年春”之误。

¹³ 据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于2004年9月23日向笔者口述。

¹⁴ 据《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和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周和康2016年1月31日对笔者口述。

理于 8 月 30 日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宋庆龄名列第一。9 月 1 日，他在对红卫兵讲话时，特别强调要尊重宋庆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传达了周恩来关于保护宋庆龄的指示后，卫戍区一师、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各单位派人进驻宋庆龄住地，制止了红卫兵的冲击。1967 年 1 月，国管局被造反派夺权。为了确保宋庆龄住地的安全，周恩来曾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到宋庆龄住地，向工作人员传达他的指示：不出去参加运动；不参加群众造反派；安心工作，为宋副主席服务好。但事与愿违，北京宋宅仍有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国管局的造反派，并在警卫秘书孙某（宋庆龄原警卫秘书隋学芳已于 1963 年 10 月回上海探亲时中风导致半瘫痪而无法工作。——笔者注）的领头下在宋宅造反。他们对宋庆龄的服务不再尽心尽力，而黎沛华和刘一庸也受到他们的斥责，被禁止陪宋庆龄共用午餐，理由是黎沛华历史不清白，刘一庸出身不好。不久，宋庆龄安排黎沛华和刘一庸回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不再从二楼卧室到楼下餐厅用餐。她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后，急电从浙江大学调回张珏来京任她的秘书。^①

黎沛华回到上海之后，依然居住在中福会的职工宿舍，而宋庆龄与她之间也依然保持着往来。宋庆龄知道她生活困难，赖以生存的退休金只有 45 元，所以宋庆龄定期资助她。^②宋庆龄曾送给黎沛华很多东西，包括她住到五原路后宋庆龄送给她的一套实木家具、宋庆龄母亲买的貂皮等。^③宋庆龄还将自己省下来的一笔钱送给黎沛华，“让她过好生活”。^④

黎沛华生前从来不向宋庆龄或者中福会提出解决个人问题的要求，女儿小丽对此的评价是：妈妈是个有信仰的人，她追随宋庆龄是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不存在想要回报的念头。^⑤正因为如此，宋庆龄对这位忠诚的老朋友、好姐妹生前多加关照，身后也始终难以忘怀。

^① 据《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关于黎沛华回沪的具体日期，她的女儿黄小丽也不记得了，她说：“以下二点回忆可给出一个时间段。1、1967 年年底约 11 月份研究所组织我们去各地串联，我随北上的同事去了北京，住在七机部丰台某设计院沈瑜父亲（黄小丽丈夫——笔者注）宿舍里，与母亲联系后在后海北沿附近见面，母亲带我们共进午餐。2、沈元（黄小丽之子——笔者注）出生于 1969 年二月母亲在上海，68 年 7 月初做早孕检查时母亲也在上海。所以我感到母亲是 68 年上半年回上海的。”

^② 见宋庆龄 1972 年 3 月 24 日致陈翰笙函，《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第 38 页。

^③ 据黄小丽 2014 年 12 月 2 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宋庆龄 1972 年 3 月 26 日致黄小丽函。

^④ 宋庆龄 1972 年 4 月 4 日致沈粹缜函，邹嘉骊编：《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1 月版，第 29 页。

^⑤ 据黄小丽 2014 年 11 月 24 日对宋庆龄陵园文保部主任李纯涛、副主任余菁口述。